

从关心政治到研究政治 (代序)

一个人选择什么为职业往往是件很难说清楚的事。但说到我自己为什么以政治研究为职业，却似乎有点象前生注定，因为我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虽然收在此书里的文章都是过去十几年写的，如果要问我为什么写这些文章，就得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了。

三元里小学

我是唱着“要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读着《南方来信》度过小学年代的。其他小伙伴未必对古巴，越南感兴趣。而这些遥远的国家却让我着迷。那时家里订了一份《参考消息》，每天一到时间，我就会跑到父亲单位的传达室去取报纸。那年头，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订到《参考消息》。大人看到我这个“小鬼”也大模大样的读《参考消息》时，往往会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你看的東西。”读报真可让人长见识。六五年的一天，我从报上读到一则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消息，这类消息本身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但那篇报道最后说，“在座的还有毛主席的夫人。”这对我可真是天大的发现：“毛主席居然也有夫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毛主席这样的伟人也会像普通人一样娶妻成家。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我被指派在全校大会上发言。那是我写的第一篇批判稿，现在已想不起来当时是如何凑成的了。

小学毕业升中学使我对另一个政治概念有了切身体会：“阶级成份。”我在武汉市三元里小学的小伙伴们被拆散了。成份好的被分配到市重点学校——实验学校；成份不好或不太好的被分配到远近有名的“流氓学校”——四十一中。我当时在班里任少先队大队委，与中队长王宪民关系很好。王宪民的爸爸据说在海南岛当科学家，他本人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惜的是他成份不太好，被分到了四十一中。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政治就可以这样无情。

实验学校

进入市实验学校时，文化大革命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高中部的大哥哥大姐姐已纷纷离校外出串联。我那时才十二岁多，但自我感觉已成熟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种豪气冲天的口号激励着我借此机会到外面闯一闯。六六年十月，我与几位小伙伴背着背包到了首都北京。在北京我们没去颐和圆等名胜景点游玩，而是认认真真地花了不少时间抄大字报，无非是署名姚文元的《海燕》，《墙头稻草》之类。当然到北京的最大愿望的是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那段期间，毛主席两次接见红卫兵，我都参加了。只是涌到天安门下才知道，这城楼是很高的，只能看到上面人的轮廓。到底看到的那个人是不是毛主席，自己心里也没底。但是在别人面前还是很兴奋地喊，“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从北京返回武汉，学校里已成立很多组织。我申请参加《红卫兵》，但也许是因为成份不够硬，没被批准。正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总站》

招兵买马，我就入了他们的伙。但毕竟只是个初一年的学生，没人把我当回事。为了过革命的瘾，我和几个小伙伴回到三元里小学，弄到油印机，钢板，纸张；然后又到市委大楼占了一间办公室。于是我们自己的《武汉市毛泽东思想小八路》诞生了。隔几天我们就刻印一批传单。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在闹市区向人群撒出传单那种感觉。看到人们纷纷抢那从天而落的传单时，我着实过了把电影中那种革命工作者的瘾。不料好景不长，家长们很快发现了我们早出晚归的秘密，加上他们此时自身难保，于是我们被赶回了家。

此后两年中，武汉文革高潮迭起，“二八声明”，百万雄师，六七年六月，七月的大规模武斗，“七二零事件”，大联合，三结合，钢新之争，成立各级革委会，六八年夏天的抢枪和武斗……。这一切令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眼花缭乱。我既是这些事件的观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参与者。说是观察者，是因为哪里热闹我就往那儿跑。即使人到不了现场，也会想方设法找各方的传单和小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完这些印刷品后，也没有随手丢掉，总感觉某一天可能有用。没想到二十年后，当我着手研究文革时，它们果然派上了大用场。说是参与者，是因为这期间我又加入了几个红卫兵组织。至今我还保留着武汉《中学红联》的兵证和实验学校《红旗兵团》的袖章。《红旗兵团》以学校新教学楼为据点，把各楼层用铁栅栏分隔，并用课桌椅垒起工事。高中生没事时常聚一起打扑克，输者罚背唐诗一首，让我甚是佩服。现在三十年已过去了，想起发生在六七，六八年的事，仍历历在目。

初中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飞逝而去。三年里断断续续加在一起恐怕只上了一年课。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后，大部分同学到湖北襄樊地区上山下乡。我和班里的十名同学升入了高中。这时社会上的风浪暂时平息了下去。我开始有时间和精力读点书了。课堂里教的东西很乏味，“毛泽东思想课”，“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都很枯燥。最叫人学得没劲的是英文课，成天是“毛主席万岁”，“缴枪不杀”之类的口号。我的对付办法是上课时看杂书。那几年是我读书最杂的时期，中外文学经典全是那些年读的，包括莫泊桑，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契科夫，雨果，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曹雪芹，冯梦龙，罗贯中，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等人的各种作品。说来惭愧，文革以后，反倒没有再读过这些大家的书。我这时还迷上了诗歌，到处搜罗新诗和古代诗词。古的读李白，杜甫，辛弃疾，李清照；洋的读马雅科夫斯基，雪莱，普希金，惠特曼；当代的读闻一多，徐志摩，臧克家，艾青，戴望舒，闻捷，郭小川等。高中在学校学到了什么已全然记不清，只记得两首诗的残句。一首是语文课许老师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写的，现在只记得结尾两句：“天上也，东方红；地下也，东方红。”另一首是野营拉练时工宣队洪指导员写的，也只记得最后几句：“悠高悠伏‘三八’，是兵是民难分；足下程程播火，茁壮辈辈新人。”虽然这两首诗的政治性很强，但琅琅上口，几十年过去后竟还记得几句。

高中时期我也开始啃大部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家里那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还学着毛主席在书上写满了评语。七零年前后中央要求干部读马，恩，列宁的六本书。我不自量也认认真真的读起来。《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法兰西内战》并不难读，《哥达纲领批判》也还凑合，但《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

不好对付了。当时各级革委会印发了不少学习六本书的辅导材料，而我却“高标准，严要求”自己，坚持“读原著”。这两本书反反复复读了无数遍，直到懵懵懂懂自以为掌握了其精髓才罢休。

高中快结束时，有两件事对我冲击很大。一件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公开以前，我已感到有什么事不对劲。《参考消息》九月下旬一则消息说某苏联领导人从外地赶回莫斯科讨论中国发生的事情，我就琢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另外，那段时间常听父亲说他梦到又打仗了。他以前似乎从不作这类梦。事后知道他已听了内部传达，所以开始作恶梦。林彪事件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毛主席那么伟大，为什么选接班人看不准人呢？”这也是当时几亿中国人心头的疑问。另一件事只发生在我身上。一九七一年，东巴(今孟加拉)要求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中国官方报纸却说是印度试图将东巴从巴基斯坦分离出去，并说这个阴谋不可能得逞。我对官方的说法深信不疑。于是在班里的黑板报上写了一篇题为《东巴必胜》的短评，说东巴人民一定会识破印度的阴谋，维护巴基斯坦的统一。但事态发展的结果却与我的预料恰恰相反，孟加拉於七一年底正式宣告独立。虽然班里同学没有任何人说什么，我却为自己的政治判断能力感到十分难堪。进而也对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一次产生了疑问。

堤角中学

高中毕业时，我已作好准备上山下乡炼红心，谁知却被留在城里当中学教员。在武汉第一师范学校培训几个月后，便被分配到市雷锋二中教初中数学。在雷锋二中教了半年书，又被送到武汉第二师范学校培训。半年后被分配到城乡交界处的堤角中学。此后在堤角中学一待就是五年。我这个半吊子高中生成了带高中生的班主任。到七八年初离开堤角中学时，我已被评为市里的先进教师。我当教师的诀窍是从马卡连科的《教育诗篇》学来的。具体说来就是，该严时严(包括体罚)，该松时松(对学生偷唱《外国民歌二百首》上的“黄色歌曲”网开一面)，关键是自己要有让学生佩服的真本事。工宣队对我的方法不赞成，但又无法否认我这套办法行之有效。即使是被我揍过的学生也不恨我。

在堤角中学期间，我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这两套书里几乎每篇文章都或粗或细地读过一遍。列宁的理论主要是革命的理论，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涉及的范围则广得多。在当时舆论一律的形势下，读马恩著作常常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历史是另一个下功夫较多的领域。先从《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入手，然后开始一套套地读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还促使我涉足古代思想史领域。诸子百家的书读了不少。现在我还记得七四年夏夜光着脊梁读《韩非子》的情形。一方面它让人觉得此公快人快语，看问题尖锐，透彻；另一方面，书中推荐的那些统治术又让人不寒而栗。

七三年以后，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组织人马翻译了一批外国文学作品，如《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白轮船》等。同时，上海还分门别类出版了一套文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生物等方面的《摘译》杂志，供内部发行。这些书当时全是抢手货，因为它们是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人人希望先睹为快。为交流书籍，无数个朋友圈子形成了，一环套一环连成一张无

形的大网。经常有这种情况：朋友的外地朋友路过武汉，带了一本书，可以让我读几个小时。我骑车取来，匆匆读过，再骑车送还。

这些读书的圈子往往也是传递政治信息的圈子。我和一批朋友几乎每周都要聚一两次，交流小道消息，也交流思想。通过交流，我们对局势的看法也越来越离经叛道。七六年春节，我们没休息，偷偷摸摸用油印机出版了一本自己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无产阶级专政》，供朋友们传阅。其目的是表明对“全面专政”理论的不满。那架式完全像是地下党在活动。

七六年初那种诡谲的政治气氛让我十分不安。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对时局加以思考，我向学校请求到校办农场去工作一段时间。在农场，白天干农活，晚上在煤油灯下读书，熄灯后便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国电台有关中国局势的报道。虽然远在乡下，仍时时摆脱不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马上借故赶回武汉，与朋友一起分析中国的前景。我当时的立场已完全站在了执政者的对立面。但在政治高压下，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七月朱德委员长逝世，九月毛主席撒手人寰，而北京传来的信息仍让人压抑无比。那几个月是我一生中对政治最绝望的时期，脑海里不断涌现出两句话：“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传说毛泽东在病榻上叹息，“恐怕要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当时我断定，毛死后，内战难以避免。

我的判断再一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十月的一天，武汉大街小巷突然贴满了“打倒王张江姚”的标语，惊愕之后，当人们认识到四人帮真的被推翻时，不禁欢喜若狂。我也为自己的判断错误而庆幸。

四人帮被打倒后一年，高考恢复，我迫不及待地报了名。我家从没人上过大学。父母只有小学程度，进城后，才上夜校补习成单科高中。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愿望。但在文革期间，只有工农兵才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身为中学教员，大学与我无缘。现在有了机会，岂能放过？上大学学什么呢？由于我已教了几年高中数学，同事们纷纷劝我报理工科。而我本人的兴趣则在哲学。我报的三个志愿依次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系。一位学校领导看我报的全是重点大学，好心劝我至少报一个非重点院校，而我不为所动，志在必得。七七年底的一个星期天，我带班里的学生到学校义务劳动，中午时分，那位学校领导从远处扬着一张纸片向我喊：“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原来他已将刚收到的入学通知书拆开了。那一瞬间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北大录取了我，但却分配我到法律系，让我在高兴之余，有点小小的失望。

北京 大 学

几个月后，我已坐进了北大的教室。北大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很快我就体会到，北大的优势其实并不在它的教员，而在它的学生。北大固然有一批一流的学者，但相当多的教员水平一般。不客气地说，教我英文的老师还不及堤角中学一些英文教师的水平高。其它很多课也上得让人昏昏欲睡。即使有些大名鼎鼎的教授，稍一接触，也顿时失去了头顶的光环。上北大的一个好处便是帮助学生破除对名家的迷信，增强他们对自己的信心。

北大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尤其是七七，七八，七九这三级的学生集中了在社会上压了近十年的人才。不少人上大学以前已在自己专攻的领域颇有修养。更重要的是，这三级学生普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在课堂上，在寝室里，在未名湖畔，我们无休无止地讨论着家事，国事，天下事。思想的撞击使每个人的境界都得以升华。我到北大后的第一篇文章是与班里一位同学合写的，记得题目是“全面评价毛泽东同志”。文章的主旨是说明一个现在看来不证自明的观点：毛主席也会犯错误。但在当时说这种话还有一定政治风险。文章通过一位认识团中央书记韩英的同学转交《中国青年报》，但“泥牛入海无消息。”好在不久这种看法便成了政府的正式立场。

除了同学，北大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图书馆。从那儿，我开始接触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有关“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我和哲学系同学与美国留学生举办的“异化”问题讨论会，开了北大这方面讨论的先河。同时，经济改革模式问题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模式，还翻译了他们有关工人自治一些法规。我第一篇学术文章发表在武汉出版的《江汉论坛》上，谈的是经济法问题。当时经济法还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

到北大读书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好处，这就是身处领风气之先的首都北京。武汉那时政治气氛还相当沉闷，而北京却不时有阵阵清风吹过。中山公园的“新春画展”，美术馆的“星星美展”，八一湖畔的《今天》诗歌朗诵会，西单的民主墙……哪里有这类活动，我就骑车赶到那里。从社会大课堂里学到的东西决不比在北大校园内学到的东西少。

到大学三年级时，法律系已有了好几位外籍教员。他们讲的“海商法”，“合同法”引不起我多大兴趣，但我仍坚持上他们的课，因为他们偶尔会讲些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趣闻，同时能提高英文听力。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比较宪法。在上龚祥瑞先生的《比较宪法》课时，他对我居然会提出有关西方“利益集团”的问题很赞赏。那时，“利益集团”在国内还是个十分陌生的概念，我也只是在阅读英文《美国政府》之类的书时刚刚接触到它，对其还不甚了了。龚先生对我另眼相看，使我有机会成为他家的常客。在他的指导下，我对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宪制有了进一步了解。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利益集团在西方政治中的作用。它被龚先生收入八三年编写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中。

快毕业时我决定考出国研究生。笔试并不难，口试却碰到点问题。有位老师要求我就电影《苦恋》谈自己的看法。这部电影当时是受批判的，而我对那种批判有保留。问我这个问题，不是在考我的业务水平，而是考我的政治立场。我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回答的，但不久就传说，系里有人认为我有点“自由化”倾向。因此，我对考不考得上研究生没太大信心。正好我妻子在武汉快要分娩了，于是请假回汉迎接孩子的出生。谁知女儿出生刚一周，北大来了一份电报，通知我到北京语言学院进行出国培训。这样，我不得不告别妻子和女儿，赴京作出国准备。

龚先生对我能出国学习似乎比我自己还热心。他亲自带着我拜访他的老师钱端升和政法界的泰斗张友渔，恳请他们为我写推荐信。承蒙二位老先生厚爱，同意为我出据他们签名的推荐信。不过这里有个小秘密，信得我自己写，他们只是署名而已。出国以后才知道，国外大学的教授根本不知道谁是中国的名人。推荐信还是由熟悉自己的教员写最好。教育部给我定的出国学习专业是“司法行政，”我一查资料，发现在美国“司法行政”是指诸如监狱管理之类的琐事，于是自作主张申请了与比较宪法最接近的政治系。

康奈尔大学

女儿八个月时，作为第一批获美国政府富布莱特奖学金资助的中国研究生(共三人)，我离开了北京前往纽约上州的绮色佳镇，康奈尔大学的所在地。康奈尔是学习的好地方，因为离它最近的大城市(纽约)也在五小时以外。除了精心读书，你别无选择。有人觉得那儿太偏僻，我倒觉得它十分对我的胃口。与北大比，康大有三点让我特别喜欢。一是选课自由，除很少几条限制外，你爱选什么课就可以选什么课。二是考试少，写研究报告多。三是所有图书馆都开架。记得到康大的第一个学期写过两篇研究报告。一篇是为“中世纪史”课写的，题目是欧洲王位长子继承制的起源。这个题目是自己在读书中想出来的，虽然以前似乎没人对此作过研究，我却写得很顺手，得了个A。另一篇是为“比较革命”课写的，题目是教授专门为我一个人出的。教授告诉我，美国有位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专家叫柏克，他认为旧中国的土地分配并不是很不平均，因此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完全没有必要。教授问我有没有能力写一篇文章反驳柏克。我应下了这个挑战。在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后，我决定以柏克的信息来源为突破口。柏克的研究靠的是金陵大学学生回家乡为他收集实证数据。但那时能上金陵大学的学生一定出生于中上等人家。靠这类人收集数据很可能使数据出现偏性(bias)。为了证明这个假设，我从国民党政府地政研究所的出版物里找到了一些有关柏克研究过地区的实证资料，还从当时出版的《东方杂志》里找到了有关这些地区的报道。将柏克的数据与我找到的数据相对比，答案就十分清楚了：柏克的数据大大低估了土地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对我这篇报告，教授大加赞赏，我自己也为能独立进行实证性研究而感到十分高兴。

有了好的开端，我对按美国的学术标准写研究报告不再害怕，反倒是期望多一些机会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以后在《美国工运史》课上，我还写过一篇教授评价很高，自己也相当满意的报告。美国政治史里有一道难题，即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其它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会党或工党。不少名家都试图提供他们的解释。我的研究基于一个简单的观察：在由英国移民为主的四个国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有较强的工人运动，而且澳，新两国是工党最早执政的国家，美国是唯一的例外。那么美国与其它三个国家有什么不同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它三国移民的来源比较单纯，而美国的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别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时，美国各移民群体内的工人组织却无法相互协作，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运动。早来的移民(英国，德国)认为新来的移民(意大利，波兰等南欧和东欧国家)抢了他们的饭碗。同是工人，白人又不愿与有色人种搞到一起。于是，工人运动内部分裂成无数个小组织，无法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资本家则可以利于工人阶级内

部的分歧挑拨离间，从中渔利。对于我的这个解释，教授认为颇具新意。后来再开此课时，他还曾将我的报告发给学生作参考。

在康大我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其中不少是北大校友，但更多人来自国内其它院校。我们经常在周末聚在校园里的 Sage Hall 聊天。逐渐地，周末聊天成了定制。于是我们决定将周末聚会正式形成制度，称之为 Sage Seminar。Sage 在英文里是指“圣贤”，Sage Seminar 于是就有了“圣贤会”的意思，这让我们好不得意。从八三年起到八九年，Sage Seminar 每周一次，几乎从未间断。一般情况下，每周有个主讲人。讲题涉及国际关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文学，戏剧，心理，环境，建筑，农业，数学，生化，物理，天文……无所不包。唯一的要求是主讲人要力求让非专业的人能听懂。隔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安排无主题讨论。这时谈话的焦点一般集中在时事政治上。如果说在康大受到的教育训练对我日后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的话，Sage Seminar 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当年 Sage Seminar 的中坚份子，不管其专业是什么，后来都对人类事物有着广泛的关怀和兴趣。交流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聪明了一些。

八五年，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其中在美国政治领域的考试获“特优” (Distinction)。考试委员会的评语说，这是近年来最好的答卷。下一步就是写博士论文了。写什么呢？出国前的打算是以研究西方政治为主攻方向，但在美国待了几年后，却觉得用学到的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更有意思。于是，我马上想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

一旦定下来写文革，首先要了解的是两方面的情况。一是西方对文革的研究已有什么样的成果。吃人家嚼过的馍就没意思了。二是在美国能找到多少有关文革的原始资料。泡了几个月图书馆后，大致摸清了两方面的情况。虽然西方有关文革的书籍和文章可以称得上是汗牛充栋，但基本上是“以毛为中心”的研究。其重点是分析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和围绕毛召开的权力斗争。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出现了一些有关文革学生运动的研究，但集中在广东和北京两个地区。以毛为中心研究文革，是史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伟人史观”的表现。谁也不能否认毛在文革中的关键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亿万人民的参加，文革就不成其文革了。我决定将分析重点放在群众身上。老百姓为什么会投身文革？群众为什么会分化成势不两立的派系？大众参与的行为模式有什么特点？这些便是我要回答的问题。

但如何研究群众行为呢？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宏观研究，还是解剖麻雀，对一个单位进行微观研究？前者似乎超出了我的能力，后者的普遍意义则可能遭到怀疑。权衡之下，我决定取中观路线，即以一个城市作为分析单位。这个城市当然就是我所熟悉的武汉。那么在西方能找到有关武汉文革的资料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仔细查阅过美国各主要图书馆的文革收藏品，虽然中国各地的文革出版物都有，但绝大多数来自两个地方：广东与北京。这也不奇怪，文革时，中国闭关锁国，国外收集文革资料只能通过北京的外交家和港澳的旅客。来自武汉的小报当然也有一些，但我知道那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写博士论文靠这点资料是绝对不够的。

为了收集论文资料，我于八六年回到了武汉。在武汉市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我足足蹲了三个月，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图书馆休息，我就在附近转转，思考问题。图书馆不准看文革小报目录，馆员拿出什么，我就看什么。馆里规定不许复印，找到有用的资料，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抄在笔记本上。三个月后，无论图书馆员新拿出什么材料，我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时我相信文字资料已看得差不多了。此后，我将重点放到了人物专访上。几个月里，共采访八十多人，包括武汉文革时期各大派的核心人物二三十人。让我吃惊的是，文革虽然已结束了已十年，几大派的地下网络依然存在。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互相接济，而且在分头准备各自的武汉地区文革史。人物专访让我了解到不少任何文字资料也无法提供的内情。

八七年初，返回康奈尔大学后，我先花了几个月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写出论文大纲。收在本书里的“群众与文化大革命”一文就是那时写的。不幸的是，八七年夏，本人遭遇了一次严重车祸，险些丢了性命。此后有近半年时间躺在病床上，无法工作。身体康复后才开始论文的写作。我写东西很慢，一天最多能写三四页。就这样日复一日趴在桌前，吭哧吭哧地写了一年多，终于在八九年春完成一个近一千二百页的初稿。之后，数易其稿，将篇幅压缩到九百多页，算是完成了博士论文，标题是《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据说，这是康大历史上较长的论文之一。论文之所以长是因为我当时想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系统地论证我对文革的解释；二是替武汉写一部地方文革史。如果仅仅是为头一个目的而写，很多章节是不必要的。

我对文革的解释很简单：在疯狂的表象下，文革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记得有一次在华盛顿遇到一位国内来的著名学者，她对我的文革解释嗤之以鼻，认为我要么是读洋书读昏了头，要么是太年轻没亲身经历过文革。她认为人们在文革中受了毛的蛊惑，完全丧失了理智。我反问她，“在你所在的单位，文革中是否分了派？”她不以为然地答道，“当然分了派。”我再问她，“各类人在这些派别里是随机分布呢，还是其分布有什么规律可循？”她想了想，回答说，“似乎有点规律。”我告诉她，如果人们没有理智，他们参加哪一派应该完全是随机的。如果人们加入哪一派不是随机的，则说明他们进行过选择。这种选择应是理性的选择。那位学者仍不愿接受我的解释，但也知道如何反驳我了，两人不欢而散。

我当然并不否认文革中人们的行为有疯狂的成分。这种疯狂与他们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分不开。用韦伯(Max Weber)的说法，毛属于那种有超凡魅力的领袖(Charismatic leader)。事实上，在文革期间，国外很多研究者正是用这个词来描述毛的。韦伯认为，这类领袖的追随者往往对其偶像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惟命是从，不免会作出些旁人看来奇奇怪怪的事来。问题在于，韦伯也好，其他学者也好，当谈到Charisma现象时，他们似乎认为这类领袖的追随者必然会丧失理性分析能力。但文革参与者并不是这样。如果他们真是完全丧失了自我，只会盲目地按“最高指示”行事，文革进程决不会乱到连“伟大领袖”也难以驾驭的地步。我自己的观察以及对几十人的访谈都证明，文革参与者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理性。文革这个个案说明，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追随者可以同时既是疯狂的也是理性的。这就需要韦伯有关Charisma的理论稍加修正。我认为个人崇拜有两个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对偶像充满了信赖，敬畏，

甚至有愿意为之献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偶像作为认知的对象，试图理解偶像发出的种种信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同一信息的解读有可能截然相反。文革中的“语录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情感向度可以解释为什么毛的崇拜者会有疯狂的行为，而认知向度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他们能在个人崇拜的大环境下进行理性选择。

九三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博士论文的中译本《理性与疯狂》。可惜的是，为了节省篇幅，译者作了大刀阔斧地删减。一是砍掉了分析文革前社会结构和潜在冲突的六章；二是砍去了余下各章中涉及外地文革的内容（很多章从几十页砍为几页）；三是删掉了不少细节性的描述和分析性的讨论（如对各派头面人物的刻画，对七三年至七六年武汉派系斗争特点的分析）；四是删掉了所有注释。这些不得已的删剪无疑损害了原著的学术性。中译本充其量不过是一本武汉地方文革史。

好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九五年为我出版了论文的英文本。英文版也对论文作了大幅度地删剪，篇幅从九百多压缩到三百多页，但删剪的原则是突出我对文革的理论解释，为武汉文革留史这个目的此时则至多只是个陪衬。英文书除了论证文革参与者是理性的以外，还试图解开一个理论上的疑团。熟悉欧森（Olsen）《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朋友们知道，理性的人并不一定会因为具有共同利益而参加集体行动，他们更可能采取“搭便车”（free-riding）的战略。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说文革参与者真是理性的，就必须解释文革中的种种集体行动为什么会发生。通过对比各种“理性选择”理论和深入分析文革这个实例，我发现狭义的理性选择理论难以解释文革中的群众行为，只有将理性的假设条件有限度地放宽，才能比较好地解释文革。别国的政治运动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个判断。

这样，文革的故事，我已讲了不下三遍。一次是博士论文，一次是中译本，一次是英文书。三者有大量重合的部分，但重点和细节很不一样。

耶鲁大学

八九年五月，我完成了获得博士学位的所有要求，已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回国。国内几家大学也热情欢迎我前去工作。六月四日早上，收到武汉大学的电报，说是他们已对我的住房和我妻子的工作作了安排。于是，我当即决定去武大。谁知几小时以后国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晚，我又作出了暂缓回国的决定。八九年六月四日是我一生中最高戏剧化的一天。谁知这一暂缓就暂缓到了如今。九零年七月，我应聘到耶鲁大学政治系，至今已在这儿工作了九年，是我待得最长的地方。这个系聚集了一批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学者。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一段时期，对自己学术上的进步很有帮助。

到耶鲁前一年，我已将学术兴趣转向政治经济学。九零年，我写出了收在本书里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一文。当时海外有人鼓吹，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权形式，就必须削弱政府的统治能力。我认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削弱国家能力作为转变政权形式的手段是极其愚蠢的。就目标而言，我希望在中国看到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徒有民主形式却无法为百姓办事的政府。即使在变革过程中，强政府也比弱政府更

可能完成和平的转型。这篇文章遭到海外一些人的攻击，但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此后，我对中国的国家能力，尤其是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进行了更深入地分析，并写出了几篇英文论文。九一年国内学者胡鞍钢来耶鲁作博士后研究，他看到这些文章后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开始合作。九三年五月，胡鞍钢学成回国，一个月后公布了我们俩合写的《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报告最主要的观点是，在财政包干制下，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已下降到了危险的地步，这个局面如不及时改变，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该报告一问世便立即引起了国内政策研究部门和国外新闻界的广泛注意，被人称为“王胡报告”。同年八月，中国政府决定以分税制代替实行多年的财政包干制。新华社在报道这一重大决策时引述了我们的报告说，“促使中国政府下决心摒弃承包制，是因为实行承包制十几年来国家财力，尤其是中央财力不断下降，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大为弱化。”九三年底辽宁人民出版社将该报告以书的形式正式出版，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它后来获得了国家九三年度“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和中国科学院九六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该报告影响如此之大，是我们当初在耶鲁校园写作它时不曾预料的。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后也遭到了国内外一些人的批评。我们和批评者之间的分歧有些是由于误解引起的，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在重大问题上所持立场不同。九四年以后，我的研究便集中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以收入本书里的几篇文章为例：

“效率，公平，民主”一文讨论的是改革目标。多年来，指导中国改革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认为，在分配不公已日益明显的九十年代，这个原则必须加以修正，对社会公正的关注应提到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决不能为了提高效率而牺牲公平。而且牺牲公平也未必能带来效率的提高。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决策的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两篇文章讨论的是改革的路线问题。我反驳了那种认为国家能力下降无关紧要的说法。通过列举中国因国家能力下降而引起的种种严重后果，并比较其它国家的情况，我指出，以“放权让利”为思路的改革已走到了尽头。如果不顾一切继续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最终可能导致政权崩坏，国家分裂。

“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一文试图挑战在国内学术界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神话。它分别讨论了国家在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在经济转型期的作用，以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克利兹所说，“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本来就不存在。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国家干预根本无法运作。即使能够运作，也一定是种丑恶的和残暴的市场经济。如果说建立在全能国家假设上的计划经济是个神话的话，那么由海耶克，弗里德曼构筑的“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更是个神话。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说得好，这种“市场经济”历史上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出现，因为没有人能忍受它。

“分权的底限”是我自己比较得意的一篇文章。改革以来人们对集权应有上限已不持异议，但分权是否也应有个下限呢？这个问题几乎没人问起。而它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命运的大问题，不可熟视无睹。这篇文章对分权的下限既作了定性分析，也作了定量分析。通过比较各国的横截面数据和重点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我得出结论：中国的财力分配在“性”和“量”上都已超过了分权的底限。凡事皆有度，集权和分权亦如是。过分集权固然不好，过分分权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清醒的改革者必须小心把握，在中央—地方权力(财力)分配上取得适度平衡。

财力分散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中央政府无法承担起它必须承担的责任。“国家能力与国防”一文试图以国防为例说明国家能力下降的严重后果。国防是经济学意义上最典型的全国性“共享物品”(public goods)。几乎在所有现代国家，国防都是由中央政府全额负担的。可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由于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无力负担解放军的全部开支，军队被迫“下海经商”。军队经商的后果是腐败蔓延，纪律松懈，士气低落，违法行为增多，军内反差扩大，军民关系恶化，战斗力下降。一句话，国家能力的下降导致了国防建设的削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终于在九八年七月作出了要求军队和武警与经营性实体彻底脱钩的决定。很明显，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在增强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基础上实行正税养军。

怎样才能增强国家汲取能力呢？我不认为中央政府靠行政命令收权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作法也许有效，大跃进失败后六一至六四年的收权就是一个例子。但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环境里，由于利益实体增多，财源流动性加大，各种经济关系日趋复杂，靠行政命令收权只会产生反效果。这时，增强国家汲取能力的唯一途径是以参与权换取财权。我在九零年写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里已提出这个看法。九五年底，我在《公共财政与政治民主》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这篇文章以十五至十八世纪的欧洲为例，证明实行代议制的荷兰与英国比专制的西班牙和法国具有更强的财政动员能力。接着，它又以中国农村为例，证明村民自治搞得好的村庄能够集中更多的资源办公益事业；而没有实行村民自治的地方，哪怕是正常的提留都会遭到村民的抵制。中国和外国例子说明的是一个道理：决策过程民主化有助于加强政府的财政资源动员能力。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人说，王绍光还不是不可救药，他终于认识到了集权的危害。这种评论让我不禁哑然失笑。如果评论者读书时稍微认真一点，就应该了解，这是我王某人一贯的立场。即使在最遭他们责难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里，也有一节专门讨论地方政府参与中央决策过程的必要性。只可惜他们看走了眼。

过去三年里，我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地区差距问题上。地区差距扩大是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在任何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收入分配都是中央政府的职责。中央政府可以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可是，如今在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远低于其财政支出的负担。近年来，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中央支出是靠发行国库卷来支撑的。既然中央收入应付种种其它必要的开支尚且不足，哪有多少余钱用来转移支付？结果是东西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差距不仅从道义上说是不公平

的，而且不利于中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从其它国家的经验看，地区差距可能引发政治冲突。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九五年底，辽宁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了胡鞍钢，康晓光和我合著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但我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和胡鞍钢又合著了英文的《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China》（《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将由美国的M. E. Sharpe出版社于九九年出版），它的中文版也会很快在国内与读者见面。

结语

从一个对政治现象充满好奇的小学生到一个以研究政治现象为职业的学者，我已走过了漫长的四十年。虽然我不小心在美国最好的政治学系谋了个教席，但我知道自己充其量是个蹩脚的政治学家。仔细想想，我感兴趣的“政治”实际上是毛主席当年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里的那个“大事”，而不是狭义政治学所指的那个“政治”。说到研究方法，我是地道的机会主义者，或鲁迅说的“拿来主义”者。我不愿让选题服从自己擅长的方法，而总是先选好有意义的题目，再找合适的方法，至于这个方法在政治学领域是否时髦，则不在考虑之列。在有些专业政治学家看来，我写的东西太杂，政治，经济，历史，社会，似乎什么都有一点，又似乎什么都不是。不过，我并不以此为耻。回首过去，我认为自己最有想象力的年代是上大学前那五年。那时读书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因此什么书都读；那时脑袋里还没有学科的框框，因此可以自由自在地想。上大学，读博士固然给了我机会熟悉某些特定领域的文献，掌握某些特定的分析方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在书读多了，但面窄了；分析能力提高了，但想象力萎缩了。被专业教育废掉的“武功”已不可能恢复，甚是令人惋惜。世界并不是按学科划分的方式运作的，研究世界的人当然不应受制於学科藩篱，作茧自缚。如果一个自称学者的人只对鼻尖低下那点事感兴趣，他的研究再出色，也只配被称作学匠，一如鞋匠，木匠，锁匠。我理解，真正的知识份子应关怀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不懈探索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寻求新思路。我本人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但这是我努力的方向。我也不知道未来的研究会把自己带到何方。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美国康州新港